陈翰老——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汪熙

陈翰笙同志是一个革命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卓越的国际活动家。

他解放前的岁月，大多数是在反动派不断追捕和迫害中度过的——沦落日本、避难苏联、逃亡印度、流寓美国——但这丝毫也没有能泯灭他追求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意志。在那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外反动派的严厉抨击，对国际形势的透辟分析和对学术问题的缜密研究。他的有些著作，至今仍载誉国际，为海内外学者所广泛征引。他是一个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的斗士。现代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如反军阀专制的斗争，反国民党政府的民主运动，支援抗战的工合运动，等等。都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麦卡锡的反动逆流中，陈翰笙和一些进步人士在美国的反法西斯民主活动竟一度成为麦卡锡之流重点追查的内容。

他是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世界进步事业、热爱祖国的学者和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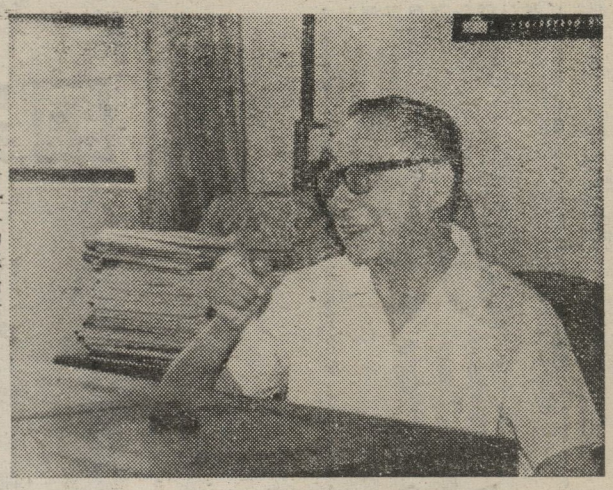
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国兴起了一代优良学风。一九二八年，经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推荐，陈翰笙担任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蔡自兼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调查。他率领了一批进步有为的青年如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跑遍了关内外和华南地区对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和租佃、雇佣、借贷关系，进行实地调查。陈翰笙和他的伙伴们用大量的实际材料分析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论证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驳斥了当时托派所说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奇谈怪论。这是一场涉及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基于这些调查而写出的中外文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一出版就在日本同时出现了两种译文本。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九四六年，在被迫逃亡到印度的时候，他冒着酷暑，几乎跑遍了印巴地区，调查农村情况，然后又参阅了卷帙浩繁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写出了《南亚经济区域》，一九八〇年在印度出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不顾劳累，踏着泥泞，亲访安徽凤阳，实地调查政策改变后的农村经济变化情况，并用英文写成报告向全世界传递了这一可喜的信息。陈翰笙是一位饱学之士，他精通英、德、俄语，但是他在不充分详细占有材料，特别是在不充分掌握第一手调查材料之前决不轻易动笔写作。他历来坚决反对概念化、公式化。因此他的著述总是内容充实、语言生动、见解卓越，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学者与革命家的气质使陈翰笙成为一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人。他二十几岁接触马列主义，具有半个世纪的党龄，是党的忠诚的儿子。凡是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事他都看不惯，而且要讲。当人们还在崇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时候，他就指出政社应该分离。他也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实行对外开放，应该发展乡镇企业，应该更新干部队伍的最早的几个学者之一。他对于不正之风的批评是严厉的。他常说：我别无所求，只希望社会主义中国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事业拨正了航向，《邓小平文选》出版后，他高兴极了，逢人便说，这是“时代的钟声”。这位勤读的老人，虽然目力极差，阅读艰难，却为全书做了详细的索引，便于别人检索阅读。他是是，非非，忠诚党的事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陈翰笙从来就把哺育青年，培养后进，作为是他责无旁贷的职守。三十年代在他的带领下，为党培育了一批卓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他从不提这些往事。每当别人问及时，他总是说这是党的培养和这些同志自己努力进取的结果。他热爱青年，凡是向他请教的年青人，他都毫无保留地谆谆善诱，传授知识，无数受过他熏陶和教诲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他那种平易近人、质朴谦逊的长者风度所感动的。直到今天，虽已年近九十，目力衰退，但仍然不辞劳苦地设帐教学，哺育青年。近年来，他多次呼吁要关心青年一代历史和经济知识的普及工作，并亲自担任《外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

今天是翰老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同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们的命运同祖国联系在一起，六十年的道路是崎岖的，但又是一路丰收的，更灿烂的日子在明天。我们敬祝翰老战斗不息，永葆青春！

（本版编辑 沈飞昊）



谈笑风生的陈翰老

帮助年青人是他最愉快的时刻

——记我的舅舅陈翰笙

壹美琼

今年是陈翰笙老先生从事革命、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又是他老人家九十寿辰即将到来之时。我是他的外甥女，是他「心上的女儿」！我有不少事要回忆，也有许多话要说。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外婆口中知道我有个勤奋好学的舅舅，十八岁就到美国求学。直到一九五〇年，舅舅应周总理之召途经苏联返回祖国。以后他作为人民代表有机会到南方视察工作，总是抽出时间陪伴我外婆。这时我才有机会见到他。他总是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宽厚的嘴唇，总是和外婆倾谈往事，仔细地聆听着外婆嘱咐。后来听舅舅说「我娘娘的话都很富有哲理，我要整理一本《娘娘语录》来纪念母亲的教导。」

从那时起，我偶尔给舅舅去信，告诉他我毕业后想当一名医生，因为我自幼体弱多病，经常要求助于白衣战士，我觉得这职业是崇高的。后来因我患病未能如愿以偿。舅舅还常常说：「美琼，你应该做医生，你一定会对病人很好！你身体不好吃亏了！」直到现在，他八十九岁高龄，见到我还要抱我，说：「看看你有多重？」每抱起后还十分开心地说：「我还能抱得起你！」

我开始和舅舅接触较多，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他从湖南醴陵干校来沪，那副模样简直难以相信——一个秃顶长发老头，干瘦干瘦的，与六年前真有天壤之别，想不到竟被折磨成这样。舅舅告诉我，在他被关押期间我舅妈患胰腺癌，他不能在舅妈身边照料，在舅妈临终前三天，还是由二个看管人员押送回家才见上一面，谁知这一面竟成永诀！舅舅说：「这次回去要把你舅妈骨灰盒从八宝山请出，按你舅妈生前的愿望，把灰撒富春江去。因为那一年一起视察江南，你舅妈说：「这里风景真好，将来我的骨灰撒到这里来！」这是我回北京后要做的一件事。」他还说，自从一九六八年起，每逢舅妈被迫害致死那一天，他滴水不进，以示对舅妈的悼念。十多年来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在干校监督劳动的环境里，舅舅还帮助一个邮政人员的女儿学习。他说：「我自己没有孩子，天下好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舅舅几十年来为人耿直，从不阿谀逢迎，对问题不仅看得深，难能可贵的是敢于说。例如人民公社的问题，党政合一的问题、体制问题、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对今天的祖国感到欣慰，虽然身体不好，仍然乐意为国为民继续出力。

舅舅疼爱我，也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也曾设法安排他来沪住，但是他总说：「到上海来没有我的工作。」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来沪的消息一经传出，他的经济学方面、历史方面的老朋友都来看望他，共同讨论问题，甚至请他去演讲。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大学生、研究生也会找上门来，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和青年人谈得十分热烈。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刻——可以给年青的人一些帮助。

如今，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寓居北京，还有那么充沛的精力辅导研究生，开英文班教学生，为中外朋友分类剪报，回复中外朋友的信件，……一天的工作量是够大的！一旦他偶尔身体不好需严格控制工作量时，他就叹息：「我活着不能做点事，不能给年青人帮点什么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活着就要工作，就要为国为民服务，这是舅舅的一条重要的生活准则。

与《中国建设》总编辑爱泼斯坦在一起　　陈素雅 摄

最·好·的·礼·物

《陈翰笙文集》问世

《陈翰笙文集》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陈翰老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最好的庆祝献礼。《文集》搜集了陈翰老在国内外所发表有代表性的四十六篇著作，其中解放前写的二十一篇。内容涉及帝国主义、中国农村经济、外国农村经济、工业合作、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文章等。

年近九十高龄的陈翰笙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蜚声国际的学术活动家，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致力农村经济调查，倡导、支援中国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民主运动，创办并主编《中国建设》英文月刊，著作甚丰，他的论点常为国外学术著述所引用。

陈翰老认为，研究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并非写历史著作而在于解决现实问题。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阶级，从中国农民问题入手，注重实地调查。解放前他全力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注重土地问题，让现实为反帝反封建服务，从而为我国土地革命提供科学依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主张工业合作社面向广大乡镇，使农村多余劳动力就地吸收，在地方建立进行商品生产的居民点。这些无数乡镇的合作经济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曾分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严重失误的原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的不相适应，“不会走就要跑跳”，当然不符客观规律。他还主张，我国不宜排斥外国资金，但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积累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陈翰笙文集》的内容博大精深，值得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界人士探究。 ·张秀杰·